

八路军“钢刀”般的战斗作风

□ 王明哲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中国工农红军处于陕北的主力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虽然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其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早已深入人心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凭借钢铁意志、灵活战术、人民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次次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锻造出“钢刀”般的战斗作风。

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八路军在民族存亡之际，以简陋武器对抗强敌，于极端困苦中浴血奋战，展现出人民军队的钢铁意志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党和军队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实践中凝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战斗精神对战争胜负起关键作用；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旺盛的战斗精神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使物质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以劣胜优的奇迹。1939年，朱德在武乡写下“亡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的诗句，展现了八路军在艰难困苦环境下舍生忘死、拼搏杀敌的顽强作风。1941年的狼牙山阻击战，马宝玉等5名战士面对日军3500多人的疯狂进攻，为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动把敌人引向悬崖绝壁。手榴弹和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块朝敌人砸，战斗到最后一刻砸枪跳崖，留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连敌人也为其不可征服的意志而感叹。在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115师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在老爷庙高地展开白刃战，战士肠穿肚裂仍以刀刺敌，近身肉搏直至同归于尽，歼敌千余人，让日军王牌部队尝到了史无前例的失败滋味，极大提高了八路军声望。在对抗日寇的无数场战斗中，八路军将士始终坚持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战斗作风，哪怕阵地血流成河也寸步不退，展现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铁骨忠魂，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将士对日作战共计10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25万余人，有34万名八路军将士血洒疆场，在烽

火硝烟中挺立成民族不屈的脊梁。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官兵一致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原则的重要内涵，体现了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真正赋予了士兵主体地位，激发了士兵高度自觉的战斗意志。1937年，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军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加以改变，而“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八路军沿袭了红军时期的新型官兵关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员与普通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极端艰苦的作战条件下，凝聚成生死与共的革命集体。《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指出，八路军“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军队，官与兵都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而不是代表剥削阶级”。朱德把实行官兵一致原则，作为革命军队管理原则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革命军队中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不应用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如家人兄弟一般。百团大战中，时任第129师参谋长的李达曾回忆：“我亲眼看到彭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和左副参谋长，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延安整风期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16团各连率先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并制定了“尊干爱兵公约”，极大改善了官兵关系，部队风气和战斗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做法在全军得到推广，部队达到了空前团结。八路军十分注重推行民主管理，强化内部民主建设，崇尚军队组织中的民主决策与管理，强调官兵平等参与。当时，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民主练兵办法，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单纯强制的办法，充分调动了练兵积极性。八路军通过民主管理，极大提高了部队凝聚力与战斗力。

坚决果断、令行禁止。八路军在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风云间闻令出征、服从大局，在以弱胜强、瞬息万变的战场中快速决策、统一步调，形成雷霆般的作战合力。从改编组建伊始，就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自觉性。在中共中央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号召下，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致电蒋介石要求合作抗日之后，

彭德怀等一众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当时，很多同志对摘下红五星、八角帽，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想不通，在第129师誓师大会上，刘伯承第一个戴上新军帽，大声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命令发出后，全体指战员含泪换帽。此后，中共中央向全国郑重宣告：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八路军从创建伊始就顺应形势任务要求，果断调整战略目标，雷厉风行完成军队改编，在作战中更是凭借高度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神头岭伏击战中，129师受命截击，部队深夜急行军60公里潜入神头岭，在光秃山脊隐蔽待敌。当日军先头部队踩过掩体时，我方指战员纹丝不动，待敌主力进入伏击圈后一令即发，三面火力瞬间倾泻，仅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无一人擅自开火或退缩。八路军从事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复杂、形势多变、人员分散、信息不畅，要求部队严格把握作战时机、灵活机动出击，方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战机。在抗日战争的无数次战斗中，正是依靠指挥员精准判断、官兵无条件执行，游击战方针“快、准、狠”优势才得以最大限度发挥，人民军队才打赢了强大对手。

逆境拼搏、出奇制胜。八路军在物资短缺、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中，往往以灵活机动战术创造战争奇迹。依托广大敌后根据地的支撑，透过“分散、集中和变换”灵活使用兵力，随时捕捉战机，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联防战、围困战、窑洞战等一系列斗争形式。按照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开展的运动战方针，八路军在敌侧后打了许多精彩的战斗。1937年10月19日夜，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充分发挥我军夜战、近战优势，迅猛突袭了日军阳明堡机场，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敌机24架的辉煌战绩，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实现了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极大削弱了日军空中优势。八路军以夜袭、奇袭、伏击等作战方式见长，常利用地形特点、群众支持将劣势条件转化为战术支点，以“诱敌一纵敌一歼敌”组合拳瓦解敌军，打出广阳伏击战、

雁门关大捷、神头岭伏击战等一系列精彩战斗。1943年的南北岱崮保卫战，八路军93人依托崮顶天险，挖战壕、修地堡、筑工事、储物资，以滚石代弹，靠夜袭破围，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敌300余人，成功牵制日军主力，为外线作战争取了宝贵时间。在灵活机动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八路军摸索出各种战法，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伤敌，不断累积战争优势，使优势转化为胜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始终将人民群众视为战斗力量的源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与人民结成了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军民一家、鱼水依存、并肩作战的作风。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傅仲在总结抗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时提出，八路军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在于积极发动群众，巩固军民团结。在发动群众上，八路军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在根据地实行解放妇女、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改革措施，发动军民大生产，带领群众自给自足、抵抗“扫荡”和封锁，争取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动员了最深厚的人民力量。在心系群众上，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正派，不论借住谁家，都尽最大努力不给百姓添麻烦，离开前一定要地扫净、水满缸，农忙时节还帮助老乡干农活，尽最大力量保护群众免受敌人伤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1944年春节，500余名日伪军进犯山东临沂朱村“扫荡”，听到枪声后，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老四团”2营8连立即赶来营救朱村百姓，经过6个多小时浴血奋战，24位战士血洒战场，书写了“钢八连”的英雄史诗。在发动人民战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在武装力量上采取“三结合”组织方式。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团的作战任务，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主要执行内线的、本土本土任务，群众在军队带领下坚壁清野、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等，不仅为战争汇聚了最磅礴的力量，也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爱戴，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奠定了深厚基础。

新平台构建和重点产业突破。释放改革动能，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向各行业、各系统、各领域延伸，从机制上打通国家综合实力向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为化解危局、把控战局、赢得胜局提供强大支撑。

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国之大事”，同样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这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历史和现实必然。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任何时候，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展才能顺利，安全才有保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过程中，首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规范发挥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始终秉持正确的治理理念，把维护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确保经济工作、国家安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符合全局利益的战略方向前进。其次，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及责任意识，形成既谋发展又促安全的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重点压实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既做到不偏不倚、协同推进，又做到守土有责、严负其责。最后，不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统筹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增强广大干部的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形成与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适应的政治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焦裕禄精神发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实践，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县域治理中激起高潮，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年时期的焦裕禄，以棍棒为笔学习功课，因家庭变故辍学后被日本宪兵队抓走投入抚顺大山坑煤矿，受尽苦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本村加入民兵队，参加制造石雷武器、探取情报等工作，并积极向上党组织靠拢，于1946年1月顺利入党。1948年2月，焦裕禄受组织抽调从山东博山县到河南尉氏县工作。在尉氏、杞县等地，焦裕禄组织开展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支援淮海战役和青年团建设等一系列革命工作；他智斗土匪头子黄老三、稳定基层政权；他深入调研、对杞县青年团开展“青年整顿”和土地复查工作，动员青年参加抗美援朝等，养成了“不笑不说话，不叫大娘大爷不说话，不叫哥嫂不说话”的群众工作方法，也孕育了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 的作风。1953年6月，为响应党和国家支援工业的号召，焦裕禄由团郑州地委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话最早诞生于洛矿的机床边，他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带领技术人员，从图纸、工艺、工具材料等方面，把整台机器的上千个零件一个个进行熟悉，自制离心浇注机，改进了齿轮烘装方法，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大型卷扬机，用科学求实精神顺利解决了技术难题，成为焦裕禄在工业战线的一个突出亮点。1962年12月，焦裕禄临危受命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以“拼上老命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誓言，以“绿我滴流，会它千顷澄碧”的决心，带领干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治“三害”行动，突出体现了他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铸就了熠熠生辉、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在尉氏县，为了解决穷苦孩子上学问题，焦裕禄推倒黄集村的神像办学堂。在大连起重机器厂，他帮助家庭困难的职工刘振才申请工资、协调工会补助。在兰考，他雪夜到火车站看望灾民、召开现场会，第二天就发出了“雪天九条”的要求。到土山寨村检查工作时，发现群众大冬天蹚水过河，焦裕禄拔出专款建桥，群众称之为“连心桥”。焦裕禄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立场，锚定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视百姓如父母，感情付诸人民，智慧来自人民，福祉带给人民，与群众心相连、情相依，不求名利、不图报答，在弥留之际提出“埋骨沙丘”的请求，生动彰显了他至死不渝的公仆本色。

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所在。不管是土改工作、工业建设，还是农业建设、县域治理，焦裕禄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发的清醒认知，凡事探求就里的钻研精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行动自觉。他总结“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笃信“不蹲下去看不清蚂蚁”，通过深入群众、广泛调研，精准抓住主要矛盾，摸清灾害规律，回应群众最迫切的期盼。在城关各区区长会议上，焦裕禄指出了在干部中存

□ 文柏松

在“一般号召多，调查研究少；一般情况多，具体经验少；领导干部原则讲得多，具体办法少……”等“十多十少”现状，以及“领导跟不上；思想跟不上；管理跟不上……”等“五个跟不上”情况，这些情况突出反映了当时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和调研不深、落实不力、担当不足等问题。突出实事求是、问题导向，这既是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尊重客观规律与尊重群众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更是兰考“三害”治理工作迅速打开局面、赢得响应的关键和秘诀。

敢于迎难而上、“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所在。焦裕禄走到哪里，实干苦干的标杆就树到哪里。特殊历史时期与兰考“三害”肆虐的困境，淬炼出他坚韧不拔的奋斗品格。他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带着干部群众顶狂风、追沙迹，创新性提出“贴膏药扎针”的治沙良方，让沙丘渐渐披绿装。面对内涝，即便肝病缠身，仍冒雨巡洪峰、勘河道，用脚步丈量治理路径。面对盐碱地，他深入田间地头，拜老农为师，推广翻淤压碱技术，培育出“韩村的精神”等四面红旗改造典型。

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是焦裕禄精神最鲜明的标识。焦裕禄克己人主义私欲，守党的规矩，克主观主义妄为，守法则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他身上化作日复一日的行动。他把艰苦朴素的职工刘振才申请工资、协调工会补助。在兰考，他雪夜到火车站看望灾民、召开现场会，第二天就发出了“雪天九条”的要求。到土山寨村检查工作时，发现群众大冬天蹚水过河，焦裕禄拔出专款建桥，群众称之为“连心桥”。焦裕禄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立场，锚定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视百姓如父母，感情付诸人民，智慧来自人民，福祉带给人民，与群众心相连、情相依，不求名利、不图报答，在弥留之际提出“埋骨沙丘”的请求，生动彰显了他至死不渝的公仆本色。

（作者系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精神丰碑

（上接1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从世情国情演变和国家发展需要出发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旨在通过释放更为强大的改革红利推动发展和安全更加协调。为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落实落地，更好统筹经济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加快形成一套更符合现代治理理念、手段和组织方式的治理体系，实现常态化的高效能治理。

形成科学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不偏不倚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具体边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必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需始终清醒认识到，安全方面的底线问题绝不容许触碰，核心利益需要坚决维护。我们既要拒绝将发展和安全简单二元对立或机械地强调一方面而对另外一方面构成伤害，避免顾此失彼、片面强调；也要树牢大历史观、大战略观，从全局利益最大化和动态效率优化出发对两者关系和各自边界进行科学界定，并找到最佳结合点推动两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从具体实践看，必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统筹

考虑短期和中长期、局部和全局、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具体边界。

在法治的轨道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按照法治原则，最为关键的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要以负面清单模式管理市场，为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空间，也要以正面清单模式明确政府职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和维护守好安全底线。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法为根本，加快构建起更为完备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包括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在内的安全领域专项法律，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专项立法中落实安全理念、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从内部看，应切实发挥好法律、规则等制度在引导预期、规范行为、预防风险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既为国家安全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执法提供法律依据，也让市场可以更好预见潜在安全风险以及相关处置规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预期，防止潜在风险演变为现实危险。从外部看，应立足国家利益，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把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同时，秉持“和而不同”的多元理念，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凝聚强大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对命题中，安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